

文化周刊

中华读书报

■本版编辑:赵晋华 ■电话:010-67078073

■E-mail:dushubao@263.net 2017年3月15日

第354期

13



记忆中的章培恒、刘季高两先生

■包立民

大学同窗聚会,谈起当年师友趣闻,时有同学学我在校园里走路姿态,右胳膊半弯,肩膀右倾,低头迈步,匆匆前行。学得惟妙惟肖,学得最像者,莫过于比我高二班的陈四益师兄,不知他是看到我走路的姿态,还是想像为之。他学得大家哈哈大笑,连我也不由自主地笑了。为什么要哭?原因是我走路的姿态,完全是学刘季高老师的偶像,一位是章培恒老师,另一位就是刘季高老师。

章师首开先秦文

章培恒当年是一位中青年教师,是最早给我们开“中国文学史”课的老师,开的是先秦时期的文学。那是1962年秋,刚升大三。记得有一次,上课铃响毕,教室外突然推门走进一位披麻带孝、头发花乱、胡子拉碴的老师,他把讲义在讲坛上一放,然后低着头,双手扶着讲坛,两眼直瞪桌面,讲课像背书,一口气背下去,不抬头,不看讲义,整整背了一堂课。这堂课讲了什么?已经了无痕,可是他披麻带孝,走进教室、走上讲坛、低头讲课的神态却像电影中的特写镜头,定格在我的脑海中。永生难忘!课后获悉,章老师的母亲刚病故,他正在守孝时期。

章老师给我们讲诗经,讲到诗经中的少男少女的爱情追求,不苟言笑的他,有时也会露出微笑。记得少不更事的我,对诗中的黄鸟为什么要交颈?颇为不解。就傻傻地向他求问,他听后,要我到校园里去观察禽鸟的生活习性,并含笑

地告诉我,交颈是鸟类示爱的表示。后来我在一首游春诗中,写下了一句“处处鸟交颈”,遭到了政治指导员的批评。章老师为我们上了一个学期的诗经课,又接任了辅导蒋天枢教授开设的“楚辞”课。他是蒋先生十分看重入室弟子,指名让章作他讲“楚辞”的助教。由于开讲先秦两汉文学的关系,我特意到中学老师顾正武家中,借得金陵局刻本《史记》(征得顾师同意,可在木板本上断句点读),在章老师的指导下,每天利用夜自修时间,用毛笔蘸红墨水,点读一卷,不解之处,向章老师求教。整整点读了一年,把130卷《史记》全部点读完成。后来,又在章老师的授意下,于众多《楚辞》注本中,选了王逸、朱熹、王夫之三家,代表汉、宋、清三代注家,汇注比较,加深理解。这本手抄汇注本,是抄在三十二开的练习簿上,可惜这本汇注本连同原书,在“文革”中全都丢失了。但是章老师教导我如何治学的方法,以及他博闻强记、独辟蹊径的治学精神,却牢牢地被我记住了。

刘师吟唱闹闺怨

与章老师沉默寡言、严肃谨慎的师风截然不同,刘季高教授则是和蔼可亲,谈笑风生。他为我们开的是唐宋时期的中国文学。上课他从不带讲义,只是在上衣口袋里放几张类似卡片似的白纸,开讲前,先吟诵要讲的诗篇,他用苏北口音吟诵,有腔有调,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委婉低吟,例如他朗声吟诵王昌龄的《闺怨》:“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只见他摇头晃脑,

抑扬顿挫,声情并茂地把诗中的闺中少妇的思念征夫的心态,淋漓尽致地吟诵了出来,然后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白卡片,对着纸把这首诗的创作背景,简明地点了出来,接着又吟诵起来,把“悔教夫婿觅封侯”的怨恨反复吟唱,尤其是“觅封侯”三个字,像京戏唱腔似的拉着长调,一唱三叹。记不清刘教授在课堂上吟诵过多少首诗词了,但据我所知,在同学中(尤其是女同学中)数这首《闺怨》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男女同学学之者最多。他为我们讲课时间最长,有一年之久。据说他当年刚从安徽大学中文系调回,一家老小分别三年,终于重新得到团聚,届年物质待遇得以改善,政治环境也稍为宽松,所以他的心情十分愉快、开朗,与我们相处也十分融洽,在课堂上常可听到他的高声朗读和谈笑声。

正是在章、刘两位导师的影响下,我暗暗立下了要像他们一样做一个研究古典文学工作者。可是事与愿违,毕业后,分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局北京电视台当编导。上世纪六十年代,电视是一门新兴的新闻传媒,与古典文学一古一今相隔甚远,由此我放下了从事研究古典文学的念头,与章、刘两位导师也失去了联系,失联二、三十年。

咸亨酒店“小酒人”

重新与章老师取得联系,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复旦校友会上,校友会五年一会,记得是学兄唐金海建议一起去看望章培恒老师。听说章老师已聘为复旦古典文学研

究所所长,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建树颇丰。关于章老师的学术研究成果,我从校友学兄处多有耳闻,先后有《洪昇年谱》《献疑集》《灾寒集》《中国文学史新著》(章培恒、骆玉明主编)问世出版,粉碎“四人帮”后,他被高教部特批教授,后又评为杰出古典文学专家。唐金海毕业后留校任教,专攻现代文学,颇有业绩。他与章老师,先是师生,后成同事,关系甚密。30多年睽别,在唐金海的引领下,我来到原本是系图书馆的古典文学研究室。只见章老师风貌依旧,瘦弱的形象没有多大改变,但精神面貌大有不同,一改往昔的严肃、不苟言笑的古板面孔,变得亲和、风趣、幽默多了。我因专业改行,见了业师总有点自惭形秽,大有难见江东父老之感。他却若无其事地与我大谈复旦旧闻。聊了好一会,他低头看了看表,对金海说,我请你们一起去咸亨酒店吃绍兴老酒吧。按理说学生拜见老师,应该学生来请,但章老师执意要请,只得恭敬不如从命。

后来听说章老师得了恶疾,靠服用美国进口药治疗,进口药要自费,他的薪金津贴基本上都用在了药费上了。但是再次见面时,他依然慷慨相邀我和金海到咸亨酒店吃陈年(上次是八年期,这次却是十年期)石库门花雕。他是浙江绍兴人,与鲁迅先生是老乡,对鲁迅十分推崇,也与鲁迅一样,对家乡的绍兴花雕情有独钟。但是章老师的酒量似乎不大,两杯酒下肚,脸色已红上脸了,望着章老师双眸微熏的神态,不知为什么,脑中突然冒出鲁迅的“余怀范爱农”,“先生小酒人”的诗句。也就在这次会上,我预感他正在主编的《中国

文学史新著》,表示要好好研读。可惜这套“新著”始终没有求到手。

西康路上“旧石库”

与刘季高教授重逢,也是在复旦校友聚会期间。刘老师年事已高,学校活动早就就不参加了,打听到他仍住在原先住的西康路老地方,记得求学时代曾登门求教过,凭着模糊的印象,我居然摸到了他的住处。令我吃惊的是,时过四、五十年,他仍住在这座石库门破旧的三楼上,因年代久远,楼板多有朽烂,上楼时地板吱呀作响。上得楼来敲开房门,只见刘老笑着迎上前来,我紧紧握着他的双手。环顾室内,一张红木书桌上放了一盏绿色灯罩的台灯,一个塞满了大、小型号毛笔的笔筒,书桌上还放着一本正在翻阅的线装书,室内陈设简单,因居室不大,连书柜也容纳不下。只得移到室外走廊上(殊不知书柜中竟藏着数千卷明清版本的线装书,刘老逝世后,这些珍贵的古籍,遵照他生前的遗愿,全部捐赠给复旦图书馆)。一个德高望重、教龄长达半个世纪的堂堂复旦老教授,居然住在这么简陋的住房中,不由感慨系之。

刘老似乎发现我的不平之色,笑着说:住惯了老地方,熟人熟路也方便,人老了,也不想动了。我问他与谁在一起生活?他回道:大女儿一直与他们一起生活。可是两次儿子拜访,我始终未见师母和师妹。事后才从师妹刘芳荪的文章中获知,师母晚年患有多种慢性病,活动不便,有时卧床不起。父亲亲自照料,吃饭服药,穿衣起坐,毫无怨言。我们多次提出要请

保姆,父亲都不同意。”(见《我心中的父亲》)难怪两次都未见家人,原来师母病卧在床,不便见人。

师生叙叙,刘老自然要问我的工作生活情况。我向他汇报了毕业后改行从事的专业,有负师恩。他听了不以为忤,反而说我从事的专业也不错嘛!我递上刚出版的《张大千艺术圈》请他指正。他也从书桌旁取出《东汉三国时期的谈论》《斗室文史杂著》两册书,刚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一题款赠我。刘老一生以教书为业,桃李遍天下,他学孔子“述而不作”,不慕名利,述而少作。可别小看这两本薄薄的著作,它是刘老一生独具慧眼、独辟蹊径的学术思想的结晶呀!诚如我校著名大教授王运熙在“悼念刘季高先生”一文中所评:“刘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史方面具有深厚的根基,广博的知识。自先秦秦汉魏下逮明清,均有论述。他的学术著作,在其生前出版的《东汉三国时期的谈论》《斗室文史杂著》两书,虽篇幅不多,但均有创见”;“谈论这一现象,在中国思想史、文学史、风俗史上均具有价值与地位,本书首次对它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而且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见复旦大学中文系先哲遗著丛刊:《刘季高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5月)恕学生不学无才,不敢胡乱置喙,只能请出我校王运熙教授来加以品评了。

俗话说树有根,水有源,饮水要思源。半个世纪以来,我的成长和些许进步,无不蕴藏着章培恒和刘季高两位导师的指导和教诲。而今两位导师都已先后仙逝,写作此文以表缅怀之情。

现代旅游者的视觉体验

■郝强

旅游,这一文化现象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正变得日趋重要。英国学者约翰·厄里提出,所有人都是旅游者,我们每个人都正处于或将要处于旅行状态。在此意义上或许可以说,旅游者是现代人身份的另一种描述。

旅游者的现代性与视觉性

提到旅游,人们往往就会想到饱览名胜古迹、品尝美食、拍照发朋友圈、购物等休闲活动。而在文化研究者的视野中,旅游是我们作为现代人重新理解自己以及现代社会本身的一个重要途径。那么,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现代旅游者”,而不是古代旅游者或者是当地居住者呢?为什么又要从视觉体验这一角度来进行讨论呢?

从时空转换的角度来看,现代旅游者出现在工业革命之后,社会生产力和财富快速增加,大多数人的可支配收入都有所提高。尤其是,交通运输行业的快速发展以及由此形成的“时空压缩”使得长距离旅行对于大众来说成为可能。在一系列客观、物质层面因素的影响下,现代旅游逐渐兴起并繁荣至今。而现代旅游之前,旅游更多的是贵族或者少数个体的非常规性行为。因此,旅游与现代化进程和现代社会转型是密不可分的。只有从现代旅游者这一主体出发,关于旅游这一文化现象的研究才能更具普适性。但是一些学者却把眼光放回古代,从《庄子·逍遥游》《楚辞·远游》《西游记》《奥德赛》《埃涅阿斯纪》等文本中讨论旅游活动,这就把现代性追溯到魏晋时期一般,忽略了论述范畴所处的特定场域,所以在旅游者前加一个“现代”作

限定是很有必要的。

旅游者对风景的感知和体验方式与生活在地旅游地的本土居住者是完全不同的。作为一个暂时获得休闲资格的人,游客自愿离开其日常居住之地,到另一处地方去参观、访问,目的正是为了体验,为了改变,总之是为探索一种与其出发地迥然有异的经验。相比而言,在当地居住者眼中,旅游者眼中的异质风景却是常态化、日常化的。

而之所以谈论旅游者的视觉性,是由于现代旅游的发生正是通过与大众媒介(也可以说是眼睛的延伸)的共谋完成的。海德格说,整个世界成为“图像”,这是决定现代本质的一大进程。在这个机械复制时代或曰拟像时代,人们时时刻刻被大量的视觉图像所包围,互联网、博物馆、主题公园等形式都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视觉景观。人从此只有通过观看才能更好地把握世界,而各种新的媒介恰好为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奠定基础。观看不仅仅是一瞬间的动作,它还是一种社会建构的行为,它是形成自我身份认同的方式;观看也不仅仅是单一的、固化的审美体验,不同的观看主体、观看方式、观看媒介必然形成不同的感知与判断。作为对视觉符号的一种收集与消费活动,旅游的过程中时时蕴藏着观看主体与观看对象之间的权力关系。

所以,思考旅游者这一群体的视觉性,其实也就是通过旅游者的视觉活动来进一步揭示现代社会的运作模式,探究旅游者的现代性。现代旅游者的观看体验绝不是一个琐碎的、无关紧要的话题;相反,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观看方式去观察世界,去反思现代人的精神状态。

旅游者观看体验的发生

从历史层面来看,现代旅游的前身应是17世纪末以来在贵族与上流社会中兴起的“大旅游”(The Grand Tour,又译壮游),此时的旅游主体是少数贵族,他们的远行多以求知或者工作为目的。此时,旅游尚未能成为大多数人的重要生活方式。然而,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旅游却逐渐成为一种“社会事实”。这一术语源自埃米尔·涂尔干,他认为,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并作为固有存在的东西,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可称之为“社会事实”。现代旅游之所以成为一种固有的存在,一种“社会事实”,正是由于旅游者实现了大众化、群体化。工业革命之后,社会阶层间的流动性增强了,奥尔特加-加塞特就认为现代社会就是“由两部分人——少数精英与大众——所构成的一种动态的平衡”。与此同时,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无产阶级工人自我意识觉醒,在经过罢工等一系列抗争后,薪酬待遇增加,工作时间也相对减少,由此具备了外出旅游的条件与资格。不过,在当代社会,伴随着旅游观看对象的日益多元化,过去的生产场所有时也会被开发为旅游景点,如旅游者会去车间参观汽车的制造过程。旅游者会由此认为工作是有意义的,而这时候的工人则成为对方眼中道具式的存在,这是一种新的异化。

从物质层面来看,除了经济财富的增加、交通运输更加便捷

等原因,现代技术(特别是视觉技术)的发展也是生成现代旅游者的重要条件。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把媒介称为人的延伸,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视觉技术理解为对人的视觉之延伸。首先从视觉观看技术来看,借助暗箱、相机、望远镜、显微镜、夜视仪等工具,观看者的视觉范围和深度扩大了,观看行为与观看者的身体分离开来。也就是说,观察者的物理和感官经验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被机械装置与客观真实之间的关系所取代,视觉经历了一种“去身体化”的过程。其次从视觉生产技术来看,人们借助工具把视觉固化为可复制的图像(如照片),甚至可以通过计算机技术创造出新的图像和影像(如虚拟影像和3D打印等)。可以说,视觉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现代人特别是旅游者的认知方式与旅游体验:一方面,为旅游者的观看提供了更多的机遇与可能,延续了观看的记忆与经验,同时由于大量视觉图像的充斥,又会在一定程度上使游客迷失其中,带来一系列的危机。

无论是历史层面,还是物质层面,现代旅游者所处的环境已与传统旅游者大大不同了。值得一提的是,当“赛博空间”在21世纪成为现实,旅游者之主体性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按照斯蒂文·吉利斯所言,这一虚拟空间或者说超空间中的主体也只是虚拟的符号,所以旅游者的身份同样可以是“虚拟”的。现代旅游者的身份因此呈现出精英、大众、虚拟者之间的动态变化。

旅游观看行为的动因

旅游者观看行为的发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由于旅游群体、旅

游情境、文化习惯的不同,其动因也大不相同,但从现代旅游者主体出发,其视觉发生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寻求差异性寻求同一性两个方面。正是在一种互为矛盾的寻求过程中,旅游者不断地建构自我身份,确立自我位置。

韦伯把现代社会的进程看作是人类不断理性化的过程。传统社会中,人的时空感是一体的、稳定的,个体总是受到土地的支配与束缚,因此旅行是一种不经常发生的行为。而资本的圈地运动却将人同土地的关系割裂了,人沦为碎片化的存在,以理性为内在逻辑的“铁笼”庞大而等级森严,冷酷地宰制着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整个社会的生存。在这样一个经过特殊训练与规划的组织系统,人们逐渐上改变了现代人特别是旅游者的认知方式与旅游体验:一方面,为旅游者的观看提供了更多的机遇与可能,延续了观看的记忆与经验,同时由于大量视觉图像的充斥,又会在一定程度上使游客迷失其中,带来一系列的危机。

在此背景下,旅游观看本身就是寻求差异性的一种表现。旅游者离开习以为常的生活,去“异域”探索新的世界,诸如名山大川、碧海沙滩、冰雪世界之类的自然景观,以及历史遗迹、园林景观、民族风情之类的人文景观,均可成为旅游者提供一种与日常生活完全不同的视觉审美对照。在出行中猎奇,发现差异,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得自我认同或者精神上的安慰。正所谓,“通往自身最近的道路就是绕着地球一周”,这种差异化的体验具有一种自我疗伤、自我发现的功效。而像巴黎卢浮宫前的金字塔,纽约中央公园里的古埃及方尖碑,现代都市中的野生动物园、植物园和老街等等,这些旅

游景观则把观看对象从其原有的生存环境中分离出来,打破了两种景观本身各自的完整性,这种差异性恰恰是其作为旅游看点的价值之所在。观光因此呈现为一种超越现代性的抗争,一种将破碎整合为一体的努力,一种企图克服现代性断裂的方式。现代人从“常人”变成“旅游者”。

在追求差异化的景观时,旅游者又期望获得某种同一性,这种同一性主要体现为身份的自我认同。社会制度、科学技术、生产关系等因素在将现代物质世界规范化、标准化的同时,也将人的心灵规范化了,其存在有时会被降格为以单纯的物质因素来衡量。因此,人们意图在旅游观看的过程中重构自我破碎的主体意识与身份。在此,寻求同一性意味着自我实现,是指在保持变化之可能性的前提下,建立自我的完全同一性,因而是一种对自我解放的期许。正是在一种对个体被单一化、原子化的反感,以及对自我解放、自我内部实现同一的渴望中,旅游者建构了崭新的自我。因此,旅游观看绝不仅仅是一种视觉动作,它还是一种再生产、再塑自身的过程。

但是,旅游观看其实也是一种逃避,所有在这一观看过程中的体验都是主观意愿在现实世界中的投影。特别是在如今这样一个数字化时代,人们所乐观看和购买的其实都是符号的幻象。或许,正是因为这些体验大多数时候都只是短暂的、肤浅的,有时甚至是虚拟的、虚假的,作为旅游者的现代人才会不时为焦虑、空虚、无聊等消极状态所困。